

张贤亮：争议背后的危机

——新作《壹亿陆》细读

■特约撰稿 曹霞(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作家作品、当代文化和文学批评。)



张贤亮在《收获》今年第一期发表了长篇小说《壹亿陆》(下称《壹》),讲述在男性健康大受损害的现代社会中,出现了一个名为一亿六(每毫升精液中含一亿六千个精子)的优异“人种”,一亿六的姐姐及其情人陶警官、想要“借种生子”的民营企业家王草根及其三奶姗姗、“不孕不育试验室”的刘主任、妄图靠精子发财的妇产科医生肚皮等人围绕“人种”展开了一场奇特的争夺战。小说发表后,受到不少指责,议论多集中于三个方面:第一,题材太过离奇;第二,形式太过荒诞;第三,某些词汇和场面描写太过低俗。面对这些指责,张贤亮进行了自辩和反诘,认为上述指责并不准确,说《壹》写的都是活生生的现实,而且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就写过比之更为荒诞的《黑炮事件》等作品,至于“低俗”的描写,那是出于人物、环境和情节的叙事需要。



张贤亮说：

我的套路多着呢。当年有谁会想到在一片荒凉的西部戈壁上去建造一座辉煌的影视城呢?但我做到了。我就是不守常规,不会走同一个路子。小说只要有趣、有可读性就可以了。

我的小说哪儿低俗了?我是一个作家,作家要写活人物,必须跟这个人物的生活环境、性格相符合吧?

我写作向来喜欢剑走偏锋,我的作品从来都是评论家们无法评价的。

此“性”不同彼“性”

围绕《壹》的争议和讨论可谓庞杂热闹,但大多流于表面化的结论,甚少涉及到小说内容,这仿佛是时代阅读的通病,当下很少有人有耐心读完一篇小说(更何况是长篇小说),却能够在争议纷呈时不甘落后。那么,《壹》是否真如读者所说的那样荒诞粗俗不可理解呢?细读小说,笔者认为,上述指责和张贤亮的自辩都不确切。《壹》并不荒诞离奇,也非空穴来风,倘若将《壹》放置于张贤亮的创作历程中,可以看到它对性问题和关注其来有自,可谓八十年代《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和《土牢情话》等小说的流风余绪。但是,《壹》远远还称不上一部佳作。

从小说涉及的内容来看,《壹》与《绿化树》等小说一脉相承之处,都涉及人类最原始的本性和欲望——性、生存、博弈等等。对于八十年代的张贤亮来说,那是在“明关暗监”的非人生涯中刻骨铭心的体验:在饥饿感深入骨髓的五六十年代,“(摘帽)右派”章永璘、石在等被发配到农场,他们既要忍受饥饿的侵蚀,又要经受精神上的折磨。在这种困境中,是马缨花、黄香久和乔安萍等乡村女性用白面馍馍、玉米饼、杂合饭等将他们从饥饿中解救出来,并以醇美的女性肉体拯救了这些软弱的知识分子。张贤亮赋予了这些女性以青春、纯洁和诗意的气息,通过“性”和“身体”等视角揭露那个荒谬绝伦的时代,使八十年代的小说冲出了性压抑和性清洁的桎梏,从这一点来看,张贤亮对新时期文学的贡献是值得记载的。

倘若说在八十年代的小说中,“性”是指向“政治”现实的批判武器的话,那么在《壹》中,“性”则成为赤裸裸的生存交易和博弈杠杆:坐台小姐珊珊在成为王草根的三奶之后,当上了夜总会的经理,摆脱了从前的窘境。她也知恩图报,动用自己的高中文化,为大字不识一个的王草根买名牌、出主意、做决定,使他的民营企业日渐壮大,并想办法从一亿六那里“借种生子”,延续他的生命力。陆姐以肉体抚慰了C城的大老板、小老头等商业精英和文化精英,在高级商务圈艳名远播,后在老板们的资助下开起了独秀居,明为茶文化休闲中心,暗做皮条生意。在一次扫黄打非行动中,她受到陶警官的保护,后成为他的情人,生意从此红红火火,成为C城著名的富婆。要论写“性”题材,张贤亮当然远远比不上某些女作家,但他的写法比那些以写“性”闻名的女作家更生理化,直观化,他似乎更津津乐道于讲授生殖知识、细绘人体生理,以致于几乎将《壹》写成了一部“生殖大全”。

那些自省和温情消失了

虽然都以“男/女”纠葛展开叙事,但在《绿化树》等小说中,这种模式呈现为“灵/肉”、“创伤/拯救”等深层心理冲突,马缨花、黄香久等女性以那个年代极为稀缺的食物和自己的肉体拯救了困顿中的男人,但最后却大多遭到他们的遗弃或出卖,晚景凄凉或下落不明。对这种始乱终弃的行为,张贤亮在文本中有不少忏悔和内省的段落,体现了作家在经受“灵/肉”煎熬时的深层反省意识,这也是他八十年代的小说之所以成为“经典”的原因之一。

但是,在《壹》中,那些质问、自省和温情消失了,由于作家将这种以“生存”或“取精”为直接目标的“男/女”交易视为理所当然之事,毫无情感挣扎和道德障碍,因此叙事极为畅滑,而这也正是危险之处。一部没有叙事“疙瘩”的小说就仿佛一面经过精心抛光打磨的镜子,它可以毫无忸怩地映照一切,却唯独看不到作家主体丰富的心灵映照。

从小说的深层指向来看,《壹》也并非人们所指责的那样“荒诞”和“离奇”,它与《绿化树》等小说一样都有明显的政治和现实功利性,《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凸显的是那段令全民陷入疯狂的“政治”现实,它是曾罹政治灾难的作家屡写不尽的资源,因此,张贤亮在八十年代的每一次写作、每一部小说都可视为作家力图忘却苦难、摆脱压抑的“白日梦”,正可谓“二十余年成一梦,此身虽在堪惊”(陈与义·《临江仙》)。

张贤亮曾经说自己是“政治动物”,称“参与政治”是“对国家和民族的崇高责任”。“学而优则仕”是中国知识分子千百年来缠绕难解的情结,倘“仕”不成,则退而求其次,下海经商也不失为最好的选择。如今,又是二十年过去了,这二十年来,张贤亮以独特的商业理念将镇北堡西部影视城经营得风生水起,作为文人“下海”获得巨大成功。是文人?还是生意人?当这两者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时,张贤亮的小说也日益走向纪实化、通俗化,《我的菩提树》、《小说中国》就是如此,应者寥寥,鲜有喝彩,与八十年代的阅读盛况形成鲜明的对比。

貌似荒诞,实则平庸

倘若考察张贤亮的创作历程和心路历程,我们对《壹》的出现就不会惊异。与八十年代相比,今天的现实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在带来人们物质富足之时,也产生了可怕的后果,那就是《壹》中“不孕不育试验室”刘主任说的“人类最大的问题是:人类即将绝灭”。张贤亮说,他写“精子战争”源于两则真实的报纸新闻:一则是说某地建立精子库,结果来捐献的百多人精子质量都不合格;另一个消息是据国家权威部门统计,中国每八对夫妻就有一对不孕不育。“这就是我们的现实。大气污染、食物污染、现代生活的压力、欲望和焦虑,精子危机是真实存在的。”他由此受到启发,构思了一个名为“一亿六”的优秀“人种”,并让各色人等围绕这个“国宝”展开了一场争夺战,这也是他称《壹》“直指当下的社会现实”的原因。

如此看来,“精子战争”这一题材并非如人们所指责的那样荒诞怪异,而是危机四伏的现实,这本可成就一部深入探寻思考人类未来的小说,但张贤亮却将这一大有意味的深刻题材简单化,直奔“性交易”和“取精”而去,致使小说在“生殖”和“身体”上花费了不少笔墨。这并不奇怪,二十年来,这个成功的生意人早已耗尽以“右派”经历为主的写作资源,又难有余暇从阅读、体验和思考中寻觅新的资源,更疏于艰难的小说技巧探索和创造力的积聚,只能将“人种”保卫战这一故事编织得光怪陆离,以图掩盖其创作被掏空资源生长点和创造力的荒凉景象。

小说的形式并不荒诞,相反,小说结构中中规中矩,采取的是传统的“顺叙法”。小说中尽管有不少貌似“荒诞”的句词和描写,如“天机不可泄露”、“本书叙述的是中国未来一位伟大的杰出人物是怎样形成胚胎的”、“王草根数钞票数得“指甲缝全裂开了花,露出红生生的肉,脓血直往外淌”等,但这些仅仅是地摊小说式的耸人听闻,并不具备“荒诞”的内核精神。在我看来,“荒诞”是一种反传统、反平庸、反喜剧的写作手法,是一种未经积淀就难以达到的写作高度。

与当年的经典文本相比,《壹》缺乏触动灵魂的情感、温暖和自省,陷入了叙事的平面化和思维的油滑状态,它可以说是张贤亮步步“俗化”、不可避免的产物。这位自称熟谙《资本论》精髓——劳动娱乐化和贩卖“荒凉”的镇北堡堡主似乎乐于以同样的理念经营小说与影视城:“我的工作就是娱乐,我的娱乐也可以是工作,对于写作、经商,我都只是抱着玩的态度。”倘若说张贤亮是一个通俗作家,我们对《壹》中乏味的情节冲突、夹生的人物形象和可疑的道德取向就不会苛求。但正因为我们中的许多人曾受到过《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小说的震撼和润泽,对他还抱有期待,所以希望他能及时清空陈旧的写作思维,换上新鲜的血液,以避免破败凋落的创作前景。